

【文学研究】

# 关中隐型文化的互补结构及其历史展开

## ——围绕资源配置方式再探关中隐型文化之一

胡义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作为关中文化开头的两大篇章,“周”与“秦”已经转化为关中隐型文化中的互补结构,其“抑商”本色在“汉唐文化”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以“抑商”为底色和以“周秦互补结构”为政治基调的关中隐型文化还表现为“儒道互补”、“儒法互补”和“儒佛互补”等。这种以多重互补为特点的“抑商”的关中隐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独领风骚,但随着资源配置方式对市场化的吁求日益强烈,它只能陷于落后,其出路在于从“抑商”向“重商”转型。

**关键词:** 关中; 隐型文化; 资源配置; 互补结构; 地域史; 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6)01-0080-11

## Supplementary Structure in Guanzhong Hidden Culture and Its Historical Launches

### ——Another Research for Guanzhong Hidden Cul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ource Disposition

HU Yi che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710065,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s the two big chapters of Guanzhong culture, the “Zhou” and “Qin” have already been transformed to the Guanzhong culture in the supplementary structure. The true colors it's “damped business” “in Chinese Donovan” center also displays distinctively. As “damped business” is taken as the bottom color and “the Zhou and Qin are taken as the supplementary structure”, the Guanzhong culture performs as “the Confucian ways supplementary”, “the Confucian method supplementary” and “Confucian Buddha supplementary” and so on. This sup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damps business” in the Guanzhong cultur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time in China to head itself in the list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but with the role of resources disposition in the marketability, it only sinks into backwardness. Its outlet 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mps business” to “the heavy business”.

**Key words:** Guanzhong; hidden culture; resources disposition; supplementary structure; region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 0 引言

作为关中隐型文化形成的两个早期阶段,“周”与“秦”两个时代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

方面都有巨大差异,而且在许多主要方面也相互对立。把早期地域文明历史转化为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和逻辑结构的过程中,关中隐型文化就形成了“周秦互补结构”。这个互补结构还引出了关中文化的

收稿日期: 2005 08 01

作者简介: 胡义成(1945),男,陕西凤翔人,研究员。

一系列“互补结构”。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中国文化史可分为三大时段: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以后从大文化角度看,这种分期不无道理。本文对关中隐型文化的历史解剖也以此为绳:第一时段形成的“周秦互补结构”在汉唐时期的展开,产生了陕西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宋元以后,这种互补结构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导致陕西逐渐落后。本文还将在略述汉唐之后,对关中隐形文化的互补结构及其历史展开加以初步概述。

从大历史的分期看,汉唐两朝是关中隐形文化深层结构形成之后的上升期,关中隐形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得到了充分而完美的体现。

## 1 汉家抑商文化略说

在政治上,汉承秦制十分明显。钱穆先生认为,从秦始皇至汉武帝,是当时大一统的中国政府“如何充实、改进以达理想境界”的过程,秦汉政体是“一脉相承”的<sup>[1]93</sup>。这一看法,事实上也是中国大多数智者的看法<sup>[2]260</sup>。在意识形态上,史有明载,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儒术祖述周公型模也是不移的事实。可以说,汉代“内法外儒”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周秦互补结构”。这种结构的展开之所以成功,在本文看来,是由于它成功地把当时的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体制融为一体,并成功遏制了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中央专制集权体制的初次强有力地冲击。

本来,汉高祖刘邦及与之对峙的项羽,均出身江淮。楚汉推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南方军功集团凭借军事强力入主关中。它应当给关中注入中国东南方的某些文化要素。

这一点,在西汉初年也有些体现。鉴于连年战乱不断,国家亟待休养生息,西汉初期若干年除继承秦制以军事强力威慑天下外,一般没有太大的动作,实行“无为而治”;在思想领域则以尊崇源自南方的黄老之术与“无为而治”相匹配。这一政策取向使社会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包括使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起来。《汉书·货殖列传》记载当时: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迄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卿,为天下高紫。樊家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

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此其彰彰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浆而靡侈,质氏以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也。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闲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成不轨奢僭之恶。

这一段文字充分地显示了西汉初年关中长安及各地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发展最快最广的时期之一。钱穆先生曾经断言:“此时贵族是崩溃了,新的军人贵族并不能取而代之。若按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但因中国传统人生思想,不允许这种富人中心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因此在文治政府之不断控制下,商业资本主义终于短命”<sup>[1]128</sup>。可以说,此判断大体是有点道理的。当时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黄老之术与之匹配,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均形成了对大一统中央集权及其基础——小农经济的直接威胁。到汉武帝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使大一统的刘汉王朝不得不在削抑市场经济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大搞独尊儒术。

由此看来,在中国古代,即使是东南人士入主关中,也不能不在周公型模铸成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轨道上运作,势使之然也。如果可以把西汉初年历史看成中国东南部市场经济及其文化对北方农业经济腹地关中的第一次冲击,那么可以说,这次进攻基本以失败告终。论汉史者,久昧于此,憾乎!

在汉武帝之前,刘濞等“同姓王”在东南起兵,以“清君侧”为名,反对中央政府而被镇压,便是这种历史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据《史记·吴王濞列传》所载,吴地有铜山,刘濞便“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如此者四十余年”。可以设想,汉高祖的这个侄子,在所辖苏南一带也是带头发展市场经济的人物。他发展了市场经济,收入大增,为了笼络人心,便不再向百姓征赋;在经济实力较强的条件下,这个“同姓王”便要求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了,于是“诱天下英豪,白头举事”,“谋作乱”,并联络了胶西、齐、胶东、淄川、济南等王,公开向汉朝中央政府

发起进攻。在《遣诸侯书》中,这位富甲天下的王爺公然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不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显然,放任各地市场经济如此发展,乃至听任“即山铸钱”,“乱天下币”,势必构成对中央政府及其财力、权力的严重威胁。冲突是必然的,也是无可避免的。还是晁错对汉武帝说得对:刘濞之事,“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究其深层原因,不在于某人与某人之间私家关系如何,而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与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在当时条件下,为了维护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权威,只能削抑市场经济。如果不削抑市场经济,其后果不仅是中央政府没有权威可言,而且可能造成国土分裂和战乱。

因此,任何一个清醒的汉室皇帝,面对刘濞这种凭依地方所有的市场经济挑战皇权的人物,都只能加以镇压。它证明了当时中国的专制皇权对市场经济只能加以抑制,决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只能形成对皇权自身的否定。这种斗争,在不懂其内因的人看来,就是关东、关西或南方、北方两地的较量。其论亦或有据,其结论则肤浅。

汉武帝去世后发生的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们围绕盐铁专卖问题的大辩论,是市场经济与专制皇权矛盾尖锐的又一次显露。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早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孔仅等人就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养,因官器煮盐,官与牢盆。俘食其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彊,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故出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不选,而多贾人矣。”此后七年,西南夷作乱,“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此年,汉武帝任桑弘羊为治吏都尉,总管天下盐铁事宜。桑弘羊上台之后,鉴于当时各地盐铁垄断官员在市场上相互竞争,使盐铁益缺,而国家付出的垄断费用还超过收入。因此建议国家进一步强化对盐铁的管理,以巩固垄断。建议获准后,使之成为汉武帝国库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后,又对酒和蚕丝实行了垄断国营,从而“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即反而从事农业——引者),而万物不得腾踊”。

这些史实反映出当时私有私营的市场经济除了可能产生刘濞那样的政治异端外,还可能使富商大贾牟取巨利,形成对国家财力和权威的严重威胁,所以汉武帝只能用垄断国营的办法加以抑制(事实上,盐铁国营垄断的主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齐国的管仲提出来了),以巩固专制皇权的经济基础。在抑制富商大贾的过程中,汉武帝实际上对其中的代表人物也实行了笼络政策,如桑弘羊等人也出身于商贾之家。盐、铁、酒、丝的国营垄断,引起了小商人的代言人“贤良”、“文学”们的批评。恒宽所著《盐铁论》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当年,在“四人帮”所谓“批儒评法”中,《盐铁论》被大肆利用,不足为凭。细读《盐铁论》,结合当时市场经济对汉武帝皇权形成的威胁来看,“贤良”、“文学”是小商人及大地主的代言人。他们反对盐、铁、酒、丝的国营垄断,实质上也是要求实行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他们与桑弘羊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市场经济与专制皇权的斗争。

“盐铁会议”是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的皇位后的第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贤良”、“文学”们对国营垄断的首要指责是“与民争利”,首要要求则是“罢盐铁,退权利”。而桑弘羊则针锋相对,明确说盐铁官营“有益于国”;如不这样,任大商巨贾狂揽钱财,则会“私门成党”、“逆节之心作”,难保皇权统一。在辩论中,桑弘羊还明确为商鞅变法中的抑商重农政策进行辩护,说商鞅之举于国有利,无可指责。他还重申韩非把农业看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贸易看作“末业”的见解,认为治理国家就应当“开本末之途”,厉行“崇本抑末”的政策。会议的结果是盐铁等事官营垄断照旧,同时也反映出汉武帝为汉朝奠立的国策基调是“外儒内法,儒法互补”。

尽管此后在思想领域出于用仁道理论笼络人心维护集权等需要而“独尊儒术”,但在经济领域,刘汉皇室对市场经济的抑制则是不留情面的,因为此事的确关乎到皇权的经济基础。

从大量古籍可以发现,汉室君臣上下当时在重农抑商问题上能长时间地达成共识,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商业发展过头,即要造成大富大贫的两极分化,而这种两极分化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巨商大贾富甲天下,必然形成对皇权的威胁;另一方面,赤穷人则可能举众起事,威胁皇室。因此作为重农抑商的配套政策,适当地抑富助贫就成了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不能不加奉行的又一基本策略。钱穆先生曾摘引了在汉武帝面前力倡“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于此事的一段著名见解: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多盗,骄则多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示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sup>[1] 120</sup>。

董仲舒的这段话,的确是对当时国家治理策略的一种高度总结,点明了祖述周公型模的儒家仁道主义为什么在汉代能达于“独尊”地位的奥秘所在。也可能是,对贫者和鳏寡孤独的怜悯,在某些儒者心中是出于真诚的仁道主义;但在统治者那里,这种仁道主义首先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的精神工具之一。

于是,不仅“独尊儒术”被奉为国策,而且儒家的一系列烙有周公型模印痕的理想也在汉代广为流传。《礼记·礼运》里便有一段被中国人长期奉为“大同”理想的描述:

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可以设想,这种“大同”蓝图,正是对中国古代大一统专制皇权与分散的小农经济彼此适应态势下,消除两极分化,以达于仁道理想的一种祈盼。它显然也继承了周公当年扩充宗族之爱以怜悯“鳏寡孤独”的民本主义,力求使之成为小农经济的精神寄托。可以说,正是这种周公型模社会理想的再确定,必然使统治者把“抑商重农”作为立国要策。在他们眼里,市场经济大发展形成的两极分化是难以忍受的社会绝症,应予坚决压抑。当时民间谚语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身为“博士贤良”的汉儒贡禹,进而直斥商人之恶并诉农人之苦:“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刈草耙土,手足胼胝”,“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现象更是深恶痛绝,而且论证的双方对于国家应当“损有余而补不足”都加以肯定。

显然,要保持皇权统一,就必须在实行“崇本抑末”政策的同时,以“中庸之道”抑制两极分化,这是作为统治者的汉朝君臣的一个重要的价值选择。这一价值选择之所以也能得到广大中小地主和农民的拥护,不仅是因为重农政策利于农业,而且还因为它在

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小农经济对平均主义的追求。薄一波同志曾说过:我国当年的“农村里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渗入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sup>[3] 128</sup>。这话说得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与平均主义价值选择之所以在中国数千年时间里绵延不绝,其源盖在它们对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与大一统专制皇权的高度适应。至于钱穆等人把汉朝的重农抑商及防止两极分化视作“社会主义”<sup>[1] 113 121</sup>,虽事出有由,但毕竟含有误解。

西汉抑商的最极端表现是两极分化和豪强兼并下出现的王莽改革,它导致了西汉的灭亡。王莽面对巨商大贾的专断横行及豪强兼并土地损“本”的严重局面,首先倾力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他宣布把全国田亩一律收归国有,再行公共分配,使耕者有其田,同时宣布厉行盐、铁、酒垄断,并对巨贾富商施以各种重税,加以各种限制。其中最突出的是王莽大胆地把当时反对市场经济的晁错和贡禹等儒生关于货币体制是两极分化之源并应予以消灭的观点<sup>[4] 153</sup>加以采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最高执政者身份,公然“废除货币制度”,这当然只能导致失败。

与这些经济上的举措相配合,王莽改制以“秦学”经典《周礼》为张本。据金春峰先生研究,《周礼》含有战国之际关中学者以法家化了的周公型模为勾勒出的社会官制规范,在这里,王莽的抑商取向与“秦学”圣典《周礼》学说合二为一,引人深思。在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里,“秦学”圣典《周礼》往往成为抑商思潮的有力工具,很能说明“秦学”的取向。由此看来,战国百家争鸣,实有“秦学”,《周礼》是代表,这值得充分注意。

研究关中隐型文化,忽略了《周礼》及其被力图消灭商品经济的王莽所用的事实是不行的。当然,《周礼》源自,古今争议纷纷,是否关中人撰写,也可再讨论,但王莽借其灭除货币经济,独步环宇,堪供关中文化研究者深远反思。

汉代以后,中国市场经济受挤压的另一个文化体制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抑商轻商,而且他们又被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以科举体制网络做官,使中国高智商人才大皆从政,或成为为朝廷服务的文人,从而使商业发展缺少应有的高智商人才<sup>[1] 128</sup>。

总之,可以把“周秦互补结构”模式之下的汉代历史看作变成皇族王公的南方入主关中者不得不采取“重农抑商”国策并与市场经济及其代表人物反复较量的历史。西汉王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

煌的时期之一,乃是由于当时大一统皇权之下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确促使了农业大发展和海内统一,使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中国“以商立国”是不利于综合国力提升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只站在传统“崇本抑末”的基础上回眸历史人物。其中,反对市场经济的观点,也成了陕西后人轻商、反商的历史基因,在今天不利于西部开发,必须加以消解。其中,以防止两极分化为据抵制市场经济的思路,包括其中小农平均主义,尤其需要我们根据市场经济,加以仔细辨析和科学扬弃式吸纳。

## 2 唐文化再回视

“倚天按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与刘邦及其后裔不同,唐太宗及其子孙虽有胡人血统,但均生长在关中,其握牢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关陇贵族集团”。有唐一代,此群体能在关西两大地主群体之间搞综合平衡,使秦汉以来日益尖锐的东西矛盾大为缓和。唐王朝的经济政策倾力于“租庸调制”,其军事体制依赖“府兵制”。所谓租庸调制,是对农村成年劳力按丁“授田”,年老后交还官府,此劳力应交之“租”、“庸”、“调”数目明确,负担并不很重<sup>[4] 406 408</sup>。这一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产权进一步明确,调动了个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贞观到开元年间,它是唐王朝繁荣的经济支撑力所在<sup>[4] 410</sup>。

由此看来,贞观、开元盛世的另一个经济支撑,是当时市场经济的繁荣。须知,唐王朝是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动荡之后出现的统一稳定政权。此前,由于一统皇权长期缺位,所以市场经济便在战乱分裂的空隙里自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巨商大贾有迅猛扩大之势,唐帝国建立之后,多年的兵事乱象也亟待休养生息并发展经济,故唐王朝开国初年,并无严厉的抑商之举。据查,课盐税实行于唐王朝开国百年之后;茶税、酒税亦大体如此;“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习见”<sup>[4] 408</sup>。在本文看来,很可能贞观开元盛世的经济根源之一,便藏在这里。何况,当时如无国内发达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进而开拓丝绸之路与国外做生意。著名的丝绸之路本质上是国际化市场经济之路,它也使中亚、南亚各民族文化和商业理念进入中国。19世纪有一位德国人来华考察,认为陕西人的精神中被“注入了中亚的尤其是土耳其的要素”,人们热心于“小本买卖”<sup>[5] 303</sup>。由此可见,这很可能就是开辟丝绸之路的后果之一。

至于唐初如此大胆发展市场经济,为何未引起汉代刘濞之乱,看来,可以用社会需求不同以及唐王朝治理国家的有关技巧来说明。关陇贵族集团在本质上是反对市场经济的,但是这种反对不是绝对的,不是超历史的。在唐初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显然有利于综合国力提升,李唐皇室也有能力驾驭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市场经济也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与放手发展市场经济相对应,唐初与汉初十分相似的一点是,南来的道家学说也成为皇室宠物,《老子》被尊为“道德真经”,唐玄宗甚至亲加注疏,颁布全国,令士庶各族习读,使互补于儒家的道家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思想上较为开放的风气。贞观、开元年间之所以辉煌,在本文看来,根本秘密不仅在“租庸调”,且在于市场经济与道家学说并为主流。

但是,不管李唐当权者是否自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毕竟不符合关中文化的“周秦互补结构”。所以,即使在贞观、开元盛世,“许多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国境内经营利财积资巨万,但中国人似乎并不十分欣赏。诗歌文艺绝不歌颂财富”<sup>[1] 164</sup>。反之,唐诗唐文之中,诅咒金钱、贱贬商业和财富的篇章却不绝于笔,李白《将进酒》那样的华章相当少见。关中文化至此显然已形成了“贱商情结”,这是关中文化的“周秦互补结构”在人们的潜意识领域长期发挥作用的突出表现。

开元以后,抑商的老节目又在李唐皇室上演了,这一出老调子是一直唱到朱温火烧长安才结束的,此后长安作为都城似乎永远被中国遗弃了,它似乎成了“废都”一座。

作家贾平凹先生说:“其实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东西在汉唐”,“西安至今全方位地保留着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sup>[6] 10</sup>。如果这些断语也是指其抑商贱商,那么本文以为大体可成立,只不过要把根子追到周公和秦始皇那里,才能显出“道统”。

## 3 关中隐型文化的“周秦互补结构”

胚胎学中有个著名的“重演学”,即个体动物在母体胚胎发育的过程。重演学在机体组织上是重演该动物进化的历史,人类尤为典型。人类思维发育的过程,也大体上重演着人类思维演进的历史。甚至还有这样的学术发现:如果对人类原始社会的某种思维现象难以索解,人们不妨去观察幼儿有关时段的思维特点,等等。这些科学事实也可告诉人们:人体本身以及作为人体机能之一的思维,都是作为

时间的人类进化过程向作为空间的人体结构机能转化的结果。时间积淀为空间,空间又对应着时间。因此,也可以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永远不可能摆脱历史对它的积淀和制约。

脑解剖学还发现,人的大脑在机体上由内向外分三层堆积,在功能上实际对应着人类进化的三大阶段。这又是一种“重演”,它再一次说明了人类思维在结构上必然对应着其历史。

所有这些科学进展及方法推论,都启发着我们从周秦互补的角度审视关中隐型文化的“硬核”结构。连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都说:“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sup>[7]52</sup>。显然,这位大哲学家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彼此转换中看待人类思维结构及其辩证法的,他已经指向统一历史和逻辑的哲学方法论。

众所周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现在已经成为历史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一原理也启发着我们在周秦互补模式中理解关中隐型文化结构。因为,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隐型文化的“硬度”一般是由该文化开头阶段的历史矛盾所决定的。

作为周代文化之灵魂,周公型模中已经容纳了炎黄互补结构,即把对生产力推进的高度重视与适当的制度文明结合起来。周公型模实际上是在当时特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上层建筑结构。它以扑灭殷商的市场化改革为历史背景,带有抑商的深刻烙印,并以“天哲学”的“重德”、“民本”等作为价值选择的核心成分,在历史的演化中又被抽象为一种抑商的“仁政”模式,并因转化发展为道家学说而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骨干意识形态,既有利于粉饰专制,也有利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缓和化解。而后的秦文化,表面上似乎在许多根本点上与周公型模相悖,包括依法家而抑智贬德,但实际上均反映着中华治理术的不同侧面。它的重农抑商和农战经济模式与大一统专制皇权体制,实际也是对周公型模进行重塑,使其能够进一步以专制集权驾驭过分分散的小农经济“氓众”,又能自如应付国内外的武力挑衅;它的焚书坑儒之为实际预演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意识形态政策的不移定则——“百代都行秦制度”。中国汉唐乃至宋元明清,其实都是周秦互补结构即儒法互补结构的具体展开和深化,这一结构的抑商战胜重商的程式后来也越来越固化。可以说,“周秦互补”构成了关中隐型文化的硬核。

这种容纳了炎黄互补内容在内的周秦互补结

构,之所以居于关中隐型文化的“硬核”地位,不仅成为中国统治者行为的潜在规则,而且成为中国被统治者也可以接受的精神型模,原因也在于周公型模本来就有以民为本的内容。这一内容又被孔子发展为儒家仁道主义,它构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沟通并可缓和矛盾的桥梁,使被统治者实际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能获得相对有限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获得及其中包含的平等追求,又与分散的小农经济必然产生的平均主义相结合,使被统治者在抑制富商巨贾防止两极分化问题上,更能与统治者的抑商取向相呼应。于是我们看到,“周秦互补”实际已经化为古代几乎所有关中人和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直到农业合作化之前,中国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渗入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曾经成为许多仁人志士愤世嫉俗、操戈起义的纲领”,许多学者和思想家、政治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影响”<sup>[3]1285</sup>。

由于平均主义的广泛而牢固地存在,一开始必然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市场经济在中国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明代陕西学者吕楠曾站在小农经济角度提出,如不抵制商品经济,农村“人多逃走,田多荒了”,“如一间门房便得一二十金,耕田得利几何?必将逐末者少抑之,人方肯去务农”<sup>[8]71</sup>。这说明平均主义必然强化人们抑制商品经济以防止两极分化的心理取向,使中国人上下一致地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对立面。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关中隐型文化中平均主义因素浓于全国各地,因为作为周秦文化的诞生地和发展源,如贾平凹先生所言,至今仍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传统文化。这就不能不使关中的市场经济发展和西部开发面对严峻的隐型文化环境。当然,关中文化的抑商因素在今天又有抑制市场经济弊端的积极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

## 4 关中文化的其他互补结构

从关中政治文化上的“周秦互补结构”,可以历史地和逻辑地引伸出一系列关中文化方面的其他互补结构。

### 4.1 哲学、宗教和人生价值上的儒道互补结构

周公型模内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形式化体系《周易》,作为倾力注目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哲学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共同理论源头。它一方面厘定了中国古典哲学异于西方“物质”、“精神”二分法的理论特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实用理

性;另一方面,则使儒道两家均以特殊角度通向为大一统专制与分散小农经济彼此适应服务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古典哲学主体部分按自己的特殊取向和形式绵延发展至今的格局。

如果说,汉武帝一方面修补完善秦始皇规划好的大一统专制体系,包括以盐铁官营等抑商政策继承商鞅当年崇本抑末的法家取向,并以笼络知识分子为皇权服务而使大一统专制体制在中国形成“超稳定结构”,另一方面,他又公开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戒防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同时把皇权专制笼罩在温情脉脉的仁学面纱之下,这本身已经形成了“儒法互补”,那么可以说,这种流传不休的儒法互补结构,也是周秦互补结构的必然的历史和逻辑结果。对此,钱穆先生认为:“秦汉以下的中国学术界可分为儒道两大派。道家站在反面,儒家站在正面”<sup>[9] 253</sup>。任继愈先生则指出:“道家思想兴盛于战国中期,它随着楚文化势力的扩大,影响至中原地区。儒家文化以邹鲁文化为中心,注重人事;老庄思想反映荆楚文化的特点,注重天道自然”<sup>[9] 58</sup>;“古代中国政治集中与经济分散的矛盾对立关系,表现在思想方面就是孔子(儒)与老子(道)的矛盾对立关系”<sup>[9] 61</sup>。而且“只有秦汉统一后的大一统国家才能维持孔子、老子两家并存的可能”<sup>[9] 60</sup>,这是因为“强化集中是中央政府的职能,要求自给自足、不要政府的过多干预,是自然经济的本性;政府要集中,农民要分散,正是在这样一对矛盾中,儒道两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并且“这两家寿命长久,主要在于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补充新的内容”<sup>[9] 57</sup>。

大体而言,儒家集中地表达了“政府要集中统一”的要求,而道家则较多地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从知识分子层面看,“儒家偏重在朝,道家偏重在野。有时同一个人,作官时讲孔孟,不做官时讲老庄;在朝讲孔孟,在野讲老庄。这两大流派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朝廷的势力大于农民,所以孔子影响大于老子。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刚建有为,自强不息,有乐天精神。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要看到道家的贵柔守雌、以静制动、安时处顺,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人们在处于劣势时使用这些原则得以转危为安。用这些原则来制民、用兵,往往收到奇效”<sup>[9] 132 133</sup>。任继愈先生此论也精当无疑。

不过,本文以为,还可以对之继续深化。能不能从汉初和唐初市场经济的大幅度发展均以统治者倡言道家学说为史实,推出关于道家在中国往往属于

有东方特色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结论呢?可不可以由此认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皇权专制者出于稳定统治秩序的要求而抑制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自然扩张之间的反复斗争,其中儒家更多地反映着抑商的取向,而道家在许多情况下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对应物和维护者,虽然它不象西方启蒙学说那样大呼大喊个人的平等自由,但是却持续地、韧性地表达着平等、个性解放及其在压抑状态下种种变形的心理要求。对此,至少应当展开讨论。梁启超先生曾把诸子百家归结为“正宗”北派儒家和“正宗”南派道家两个主流,认为“北派重阶级,南派重平等”,“北派喜保宗,南派喜破坏”等等<sup>[10] 17 18</sup>,大体上也抓住了围绕市场经济形成的儒道两家的一些特点,值得重视。看来,中国道家的特点之一,立足于中国市场经济产生很早且屡有较大发展,但一直受到大一统皇权体系、正统意识形态和全国上下主流的抑制,因此作为市场经济的特殊对应者,它便形成了半呼个人平等,半吟个人遭辱,含悲低回、委婉凄清的特殊旋律,容易给人造成上天入地茫无所归的压抑感和失落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数百年前西方启蒙学者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呼吁在一千多年以前柔弱持续的对应声音。如果说,启蒙者的呼吁是声嘶力竭,迎风呼啸,那么道家的呻吟则是断断续续,似泣似诉,像冤魂呻吟,如厉鬼夜叹。生长于市场经济之上的中国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部分所有权,则被儒家的仁道主义占用了<sup>[11]</sup>。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仁道问题上的“儒道互补结构”吧。

从纯粹哲学理论层面看,如果说儒家发挥了“天哲学”和《周易》重在人事、国事的角度,形成了“融小我于大我”的理论套路,但对其穷究“天人之际”的角度有所忽略,那么可以说,儒家在哲学上的这种欠缺,正好是道家的长项。它紧紧抓住独立于人的“天”,吸取了佛门和儒家的有关看法,建构了较为精致的本体论哲学体系。此外,作为处于“在野”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包括宗教)寄托,道家学说还倾力于人生观(包括生死观、荣辱观)等问题的开掘,形成了一种比较豁达、细致而且可以使人获得脱俗和知天命的说理,并使这种说理升格到了本体层面,从而造就了颇能服人动人,但多少有点悲凉的中国人生哲学的诞生。降至宋代,限于本体论窘境的儒家又从道家本体论(包括华山道士陈抟的太极图理论)中吸收了不少营养,进而使儒家理论升华到新的理学的境域,这又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格局。



## 4.2 审美上的儒佛互补结构

梁启超先生讲过:“六朝隋唐之间,为中国学术思想最衰时代,虽然,此不过就儒家一方面而言之耳。当时,儒家者流,除文学外,一无所事。其最铮铮于学者,如王(通)、陆(龟明)、孔(颖达)、韩(愈)之流,其在学术史中,虽谓之无一毫之价值焉可也。虽然,学固不可以儒教为限,当时于儒家之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则佛教是已”。从佛教角度看,“隋唐之交,为先秦以后学术思想最盛时代可也”,甚至它“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之光荣”<sup>[1] 10 62 63</sup>。这些话虽然多少有点偏颇,但的确是立了新视角,说了新见解,有相当根据,应予以重视。确实,隋唐时期佛教及其教理传播探究,在陕西已达于十分兴盛的状况;佛学理论研究中提出的许多哲学问题及其解惑思路,已经是当时儒家难于比肩了。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王陆孔韩的哲学水平在许多方面确实不如佛门诸子之深、之博、之新。

事实上,佛教在东汉以后传入中国并迅速流布,本身也反映了当时独尊的儒术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便是由于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人生领导中心的功用之渐次堕退”,因为“秦汉时代遵循着儒家思想的指示,大家努力向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境界而趋赴。他们只着眼于现实人生之可有理想,这一种理想之实现已足安慰人心的要求,因此不再有祈求未来世界与天上王国之必要。若一旦王室腐化,土族兴起,此种现实人生可有的理想境界逐渐消失,人心失了寄托,无了安慰,自然要转移到未来世界与空中天国去。这是中国人民在当时感觉到宗教需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印度佛教适于此时传入中国。佛教思想中之慈悲观与平等观,这是与中国传统观念最相融洽的”<sup>[1] 138 139</sup>。佛教于隋唐时期在中国立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它的平等追求。它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追求一拍即合,另一方面它正好适应了隋唐个体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平均主义需求。至于它也同时适应了失意或在野知识分子的平等情怀,那更是一目了然的。当年的东都洛阳,赫然有“平等寺”一座,堪称物证。

六朝隋唐间的佛教诸宗,祖庭在长安者占多数。从文化史角度看,这也是陕西文化与西来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汇。在碰撞交汇中出现的佛教理论,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与西来文化融合的结晶。如果说,六朝隋唐时代关中的儒家哲理推进并无大创新,那么,此时关中的佛理推进却填充了创新空间。其中包

括,长安杜预创立华严宗,长安窥基创立中国式唯识宗,长安僧肇《肇论》对俱舍宗的理论贡献等,在哲学上均独步一时。它至少在本体论上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把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能力提到了一个新层面,为此后儒学转化为宋明理学提供了一种助推剂。

如果说,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宣扬平等,那么,依我之见,纯属中国土产的禅宗却以独特的中国方式宣扬着一种变形的自由理念。本来,六祖偁出广东,禅宗是岭南文化的特产,它印有较深的市场经济烙印是必然的。钱穆先生说:“那时中国文化,还是以北方中国黄河流域为主体。但唐代禅宗诸祖师,你查考他们的履历,几乎十有八九是南方人,而禅宗的精神便是一片天机,自由自在”,“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空灵洒脱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sup>[1] 166 167</sup>。禅宗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变了形的宗教精神对应物,不仅以自己独特的学理开创了佛教的新局面,也使中国式的自由追求登上历史舞台,并以其在审美中的俏丽而流芳百世。

这种自由观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只有某种平等追求而缺少个性自由追求的奇特弥补,而且它也展示着皇权专制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个性为何以极为变态的审美形式顽强地生存着、延绵着、发展着。其中,陕西安康僧人怀让创立的禅宗洪州派、凤翔僧人无住在成都的佛学宣教等,也都体现着禅宗向北伸展以后关中智者与之合流并加推助的态势。这种态势也从一个特定局部反映出关中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已经开始了新境界,这确实值得注意。应当看到,作为市场经济对适应自己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呼唤,但在中国古代的关中,人们对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的追求,始于审美,却极富启示价值。现在看,克服异化的根本途径,藏于审美层面。人道主义启蒙运动在各国走的路子都是相似的。

如果说,适应着当时当地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欧洲18、19世纪的学者是完全直白地呼叫着个性、自由、平等的新式价值选择,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既然在集权下走着绵延之路,它就只能以受抑制的方式来呼唤适应自己的人道主义,包括在某种形势下,把对个性、自由的吁求转化成禅宗的禅悟、洒脱、自在、机缘和棒喝等。这是中国人的无奈,但也是中国人领悟降服异化之“天道”的一大贡献。在这里,中西文化之不同之处,也确令人大费思量。



## 5 关中隐型文化南北轴线模式的展开

安史之乱是中国东西模式向南北模式转化的标志。自从朱温一把火烧了唐长安以后,中国的首都就移出了关中,先向东,后来又在运河南北轴线上摆动。北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东西轴线模式被取代,关中文化纯粹成了地方性的区域文化。对关中隐型文化的研究,精确地说,今天至少应当作为两个大时段展开:其一是关中隐型文化本身就是中国隐型文化之主体的周秦汉唐时期。在此时期,作为东西轴线模式之中“西”的代表者,关中隐型文化表现出多方面的生命力,同时也形成了抑商的固有品性;其二则是北宋以后,关中隐型文化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南北轴线模式推出了新的形态,并作为一种纯粹地域性隐型文化而在中国文化中落为日渐次要的地位。在后一时段,一方面是关中隐型文化固有生命活力在延续、在发挥;另一方面,则是它的消极面已经逐渐变成了关中发展的瓶颈,越来越严重地拖住了关中人的后腿,使关中近代以来几乎成为守旧、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如果说,历史文化的东西模式已包含着发展市场经济与抑制市场经济力量之间的反复较量,其中“周革殷命”实际是后者战胜前者,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轴线模式中,这一纷争和较量的成份就更加浓重和明显,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南北斗争,深层次的经济根源,便是市场经济力量与抑制、限制和反对市场经济力量的搏斗,其中关中文化的落后性很显然。在中国南北搏斗中,关中隐型文化的抑商痼疾越来越暴露无遗,并要持续顽强地表现自己。本文以下的部分,便是对第二时段的粗略展开。

这一扫描的背景是中国历史上东西轴线模式向南北轴线模式的转换,其中包括:(1)中国市场经济在南方大发展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2)中国人口重心的南迁;(3)首都自西向东的迁移转为南北方向摆动;(4)政治斗争及战争往往从东西向为主转向南北向为主;(5)文化重心南移。此时,作为地域性文化的陕西隐型文化,是在南北轴线模式中的各种势力碰撞、适应、发展和挣扎中展开的。它是关中人的苦斗史。

### 5.1 北方的衰落和南方的崛起

从纵向上看,周人在征服殷人之后,已经对南方进行开发了。《诗经·江汉》一篇可为证。后来,秦始皇又曾派出 50 万大军征服南方,规模空前,设置了一批南方郡县,远至岭南。汉武帝多次进军百越,

并动员中原人士南下开发。三国以降,由于中原战乱频仍,南方人口大增。永嘉前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形成了南方人口巨增的第一次浪潮。南朝又把北方文化整体迁至江南。江南的市场经济在皇权专制不时缺位的空隙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形成了超过北方的局面。盛唐时期,中国南北市场经济均有大发展,但南方显然来势更猛些。试读当时诗人对南国的吟诵,不难想见盛唐时江南的繁华。至中唐时期,江南粮食产量已居全国首位,每年仅浙江省运往长安的漕米就达 75 万石。看来,黄土高原靠种粮食以保证它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是大不可能了。江南粮食永远地取代了它。唐末时安史之乱主要在北方展开,江南受损并不太大,故人口又一次大量南迁,是为第二次人口南下大潮。这一次,终于使主要在北方展开的东西模式逐渐演化成为全国的南北模式,南方成了中国人口、经济和文化重心所在。宋代靖康之难形成的大量人口南迁的“第三次浪潮”,终于使南北模式正式确立。朱谦之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以时代言之,北宋以前为黄河流域的文化”,北宋以后则为“扬子江流域的文化”<sup>[12] 193</sup>。更何况,据《元史·地理志》说,元代的南方人口竟占全国总数的九成弱,北方只占一成强。这使明初不能不实行人口大迁以填补北方空荒。显然,北中国衰败了。从经济根源而言,这是由于北宋以后,中国长江流域以及江南的市场经济实力超过了北方。明万历年间是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又一界标<sup>[13] 2</sup>。乾隆巡游江南时,尚情不自禁地说“江浙为人文渊薮”<sup>[12] 184</sup>,它孕育了上海。后来则是岭南的海运市场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 5.2 关中和长安的日渐衰落

与江南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中和长安的日渐衰落破败。

《史记·货殖列传》曾言:“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意味着汉武帝以前的关中财富占全国大半。但是,到了杜牧笔下,“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当时命官权德舆也说:“天下大计,抑于东南”。这种落差是怎样形成的呢?首先是由于长安作为十三朝首都反复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整苦了关中和陕西人。如若不信,请翻开唐以前至周的史书,试看哪一次改代换帝、哪一家的皇室争位,包括哪一次的主要宫廷政变,不是在这块黄土高原上展开的呢?这块可怜的黄土地,能无限地承载着反复发作的屠杀、抢掠、炮

火和战后饥馑么？公元 192 年，董卓在长安被杀后，关中大乱，军阀混战，竟使“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公元 904 年，朱温劫唐昭宗迁都洛阳，迫挟长安市民同迁，还把长安的宫殿和房屋全部拆毁，使长安成为一片废墟。试看，如此反复破坏，反复折腾，关中怎么能不彻底败落呢？胡适先生晚年说到陕西落后问题时认为，“多少年来的战争，灾祸，都可以使西北荒瘠”<sup>[14] 19</sup>，这算是摸准了问题所在。

关中由先进而落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社会及自然因素双重作用下，生态环境大面积恶化。有资料显示，夏商时期关中的气象和植被条件十分良好。这一点，从《诗经》的大量诗篇及《石鼓文》中仍可看出来。至少，当年关中的气候相当湿润，雨量充沛，森林植被中出没着鹿、象等动物。但是，随着近

5000 年中国气候总体上向着干旱方向发展，这块风水宝地变得越来越干旱，干旱及战乱饥荒又使植被和森林大减。如果说，唐代诗人笔下的关中还相当宜人的话，那么到了北宋，关中简直就成了一片黄色土坡。苏轼至凤翔做官，在诗中就直言不讳埋怨关中的穷山恶水。并读唐诗和苏诗，人们不能不为关中气候及生态的大幅度恶化而叹息。可以设想，从苏轼至今，这种恶化的趋势有增无减，令人深思可怕。

关中落后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关中人在抑商趋向中，只注重农业经济，往往放过机会或有意无意压制市场经济发展，特别是往往用小农经济中形成的平均主义价值选择对抗市场经济大启动，必然带来贫富差距。这实际是为反对市场经济设定了永恒的理由，使陕西和关中经济越来越落后于全国。即使后

表 1 汉代至明代中国各省人才情况

	西汉			东汉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数	百分比 /%	等级	人数	百分比 /%	等级	人数	百分比 /%	等级	人数	百分比 /%	等级	人数	百分比 /%	等级	人数	百分比 /%	等级
陕西	22	10. 58	4	73	15. 97	2	261	20. 4	1	63	4. 31	10	6	0. 99	14. 5	80	4. 51	9
河北	21	10. 10	5	28	6. 12	4	223	17. 6	2	212	14. 51	2	7	1. 16	13	128	7. 22	5
山西	10	4. 92	6. 5	16	3. 50	8	182	14. 2	4	141	9. 65	4	17	2. 81	9	56	3. 16	12
河南	30	18. 75	2	170	37. 20	1	219	17. 1	3	324	22. 18	1	37	6. 12	7	123	6. 94	6
山东	61	29. 33	1	57	12. 47	3	97	7. 6	5	156	10. 68	3	13	2. 15	11	93	5. 25	7
江苏	2. 05	2. 05	3	13	2. 84	10	82	6. 4	6	97	6. 63	5	49	8. 10	5	241	12. 61	2
浙江	2	0. 96	12. 5	14	2. 99	9	34	2. 77	9	84	5. 74	8	136	22. 50	1	258	14. 51	1
湖北	7	3. 36	8	11	2. 40	11	29	2. 4	10	19	1. 30	12. 5	14	2. 32	10	76	4. 29	10
安徽	3	1. 14	10. 5	24	5. 25	6	21	2. 4	11	53	3. 62	11	38	6. 29	6	199	11. 24	4
四川	4	1. 92	9	26	5. 68	5	12	1. 7	12	93	6. 36	7	21	11. 70	4	51	3. 21	11
江西	1	0. 49	14	2	0. 42	12. 5	2	0. 5	16. 5	12	0. 82	14	12	1. 98	12	27	11. 52	2
湖南	0	0	—	2	0. 42	12. 5	2	0. 5	16. 5	12	0. 82	14	12	1. 98	12	27	1. 52	14
福建	0	0	—	1	0. 21	15. 5	2	0. 2	16. 5	95	6. 50	6	88	14. 50	2	92	5. 19	14
广东	0	0	—	0	0	—	3	0. 2	14. 5	3	0. 20	16	4	0. 66	16	50	2. 82	13
广西	0	0	—	1	0. 21	15. 5	0	0	—	2	0. 13	17	6	0. 99	14. 5	13	0. 73	18
贵州	0	0	—	0	0	—	1	0. 1	18	0	0	—	0	0	—	10	0. 56	19
云南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14	0. 79	16. 5
甘肃	10	4. 92	6. 5	17	3. 72	7	53	4. 1	7	19	1. 30	12. 5	23	3. 89	8	23	1. 29	15
辽宁 (汉人)	0	0	—	0	0	—	3	0. 2	14. 5	0	0	—	0	0	—	0	0	—
内蒙古 (汉人)	3	1. 44	10. 5	1	0. 21	15. 5	0	0	—	0	0	—	0	0	—	0	0	—
外族	2	0. 96	12. 5	1	0. 21	15. 5	50	3. 9	8	7	0. 61	15	0	0	—	14	0. 79	16. 5
总数	208	—	14	457	—	17	1 282	—	18	1 461	—	17	604	—	16	1 771	—	9
总计	5 783																	

来朱明皇室鉴于西北边务的重要,在西北实行“食盐开中”政策等,曾刺激了明清陕西市场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商帮在明清时期也有不小的名气,但也这只能被看成一种非市场力量造成的昙花一现,它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陕西市场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东南的总格局。这种经济上的落后造成了社会意识形态抑商、压商和仇富取向的恶性膨胀,这种恶性膨胀又进一步加剧了陕西和关中的落后和在思想上的僵化,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北宋以后,作为纯粹地方性文化的关中文化,虽然开头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当年的创新气象,但在实质上已经逐渐成为全国文化发展中较少创新的成分,根本不能形成领导全国风气的群体,包括关中人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理论争鸣中往往倾向于保守落后、过时陈旧的一边,甚至直接就是保守落后的代表。虽然,北宋张载及其所立学派,在当年的中国哲坛上独标一帜,反映着周公“天哲学”后和关中哲学理论创作余勇犹存,但仔细考虑,张载理论当时已显粗陋,已难于比肩于东南地区。至于明代的关学复兴,包括李二曲的哲学,在全国哲坛上大体已成闭塞过时的象征;明代“前七子”中关陇势力不小,虽形成了对“台阁体”的巨大冲击,但也毕竟只是李贽及“公安派”、“竟陵派”的序曲而已,在文学史上作用和影响有限<sup>[13]78</sup>。可以把关中文艺在明代的这次“复兴”看成关中古代文化的回光返照。从此而后直至近代,关中人在文化上只能处在中国的龙尾部分,说来令人寒心。

## 6 南北轴线模式中关中人才质量衰落

中国各地隐型文化比较研究中最敏感的指标之一,就是该地域拔尖人才在全国总局中的质量和数量。如果说,在唐以前的东西轴线模式中,秦地出生的文武人才层出不穷,在全国往往领先,那么在北宋后的南北轴线模式中,关中人才在质量和数量上往往落后。这充分反映了此时关中隐型文化只能在南北轴线模式中挣扎前行<sup>[15 16]</sup>。

建国前,丁文江曾依据《二十四史》分别列出了明之前至汉朝有传人物,按其籍贯集中,并算出各省人物在总数中的百分比,按百分比排出各省顺序(表1)<sup>[12 186 187]</sup>。

从表1可以看出,汉唐时陕西人才在全国确实名列前茅,北宋时骤然降至第10位,南宋时继续降至第14位,明朝时略有回升,但也只排第9位。显然,随着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陕西关中隐型文化的不适应性在持续加重。这种局面后经清朝和民国,迄今也并无根本性改变。

### 参考文献:

- [1]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2]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4]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5] 沙莲香. 中国民族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6] 贾平凹. 老西安[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9.
- [7] 列宁. 哲学笔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8] 吕楠. 泽野子内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9] 任继愈. 天人之际[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10]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 [11] 胡义成. 孔子仁学奥秘再破译[J]. 福建论坛, 1991, 5(5): 38-45.
- [12] 朱谦之. 文化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13] 胡义成. 明小品三百篇[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 [14] 胡适.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 [15] 田培栋. 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M].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6] 李刚. 陕西商帮记[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